

清党以后国民党的组织蜕变

王奇生

内容提要 国共两党在有关清党历史的书写中,一方颂之为‘护党救国运动’,一方谴之为‘反革命政变’。双方都将目光聚焦于中共在这场运动中所受的沉重打击,而甚少关注这场运动对国民党自身的直接影响。对国民党而言,清党运动是一场党内人才逆淘汰运动。国民党在清党过程中的自我创伤几乎不亚于共产党所受的打击。清党之后,国民党地方党权托付无人,惟有听任土豪劣绅和投机腐化分子侵夺和分掠地方权力资源,在地方社会藉党为恶。直至抗战前夕,普通国民党员数量尚未恢复到清党前的规模,党员的地域分布与政权的地域基础不相吻合,其党务组织形态大致呈现出‘上层有党,下层无党;城市有党,乡村无党;沿海有党,内地无党’的格局。战前党员绝大多数出自中等以上社会阶层。国民党不是培养党员成为社会各界的楷模,而是网罗社会各界原有的权势人物或具有权势潜能的人加入国民党。考察战前舆论对国民党的观感,有助于我们修正这样一种观念,即认为国民党的失民心主要是在抗战后期和抗战胜利以后才充分显露的。

关键词 国民党 清党 地方党部 党员

一个政党在其政治成长历程中,大凡要经历两大难关:一是建党的第一代魅力领袖去世以后的权力继替;二是由在野党升为执政党以后的调适转换。前者有可能导致党的裂变;后者有可能导致党的蜕变。国民党显然未能顺利通过这两大关口。孙中山去世

后,胡汉民、汪精卫和蒋介石之间就党魁继承人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权力之争。蒋介石虽然最终以军权坐大,但在很长时间里一直面临着党内其他势力的挑战,直至1938年其合法党魁地位才得以正式确立。

另一方面,国民党中止孙中山的联俄容共政策以后,因/ 违教0而导致全党意识形态陷入混乱状态。党的继承人之争与党的路线之争相互纠缠。为了与共产党划清界线,国民党从政纲政策到组织路线,均改弦易辙,将三民主义意识形态中一切稍带激进和社会改革色彩的东西,统统视做/ 共党0余毒抛弃掉。三民主义意识形态的社会魅力荡然无存。党民关系由动员体制转变为控制体制。与此同时,执政以后政治权力带来的腐蚀,又未能有效加以防范和抑制。在裂变与蜕变交相作用下,执政未久的国民党即成为一个被国民厌弃的党。

鉴于以往研究多关注这个时期在国民党中央发生的政局演变和派系纷争,因此,本文拟以国民党地方党部与党员为考察对象,探析训政初期国民党/ 党治0与/ 治党0在地方层级的运作情形。随着观察视角的下移,国民党过去不为人所细察的一面亦逐渐凸显出来。¹

¹ 对清党与战前国民党组织的相关研究,可参阅以下论著:黄金麟《革命与反革命》)/ 清党0再思考,(台北)《新史学》第11卷第1期,2000年3月;1美2易劳逸著、陈谦平等译《流产的革命》,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年版;齐锡生《国民党的性质》,《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26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久保亨《南京政府成立期N中国国民党》)1929年N三中全会r中心K6,5 研究6第31卷第1号,1984年4月;土田哲夫《中国国民党党员构成的特征和变化》,/ 第四次中华民国史国际学术讨论会0论文,南京,2000年9月。

一、清党对国民党的影响

1927年至1928年间,国民党发动了一场空前规模的清党运动。在过去的国共历史书写中,一方颂之为/护党救国运动⁰,一方谴之为/反革命政变⁰。尽管这两种认知截然有别,但都将目光聚焦于中共在这场运动中所受的沉重打击,只是一方充分肯定这种打击的/弭祸⁰意义,而另一方则谴责这种打击的/罪不可赦⁰。而两方都甚少关注这场运动对国民党自身的直接影响。实际上,国民党在清党过程中的自我创伤几乎不亚于共产党所受的打击。张国焘回忆/四一二⁰政变前后的国共历史时,曾深有感触地说:/-四一二.这一幕后果的严重性,是无法精确估计的。即以蒋氏而论,他在这一幕中,固已获得胜利;但从长远来看,究竟是获利抑或负债,尚有待于历史的判断。¹ 张国焘的这一段话,我们也许可以从比较宽泛的层面上来理解。

国共合作之际,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党团组织活动是秘密进行的。除少数中共要人外,绝大多数跨党的中共党员和青年团员的身份并未公开。当蒋介石/清党⁰令下时,除少数已暴露的/共党首要分子⁰外,要从号称百万党员中分辨出谁是共产党,谁是/纯粹⁰的国民党员,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据张国焘回忆,陈立夫曾在抗战时期的一次会议上追述清党情形时谈到,清党时最大的困难,是分不清谁是共产党,谁又不是共产党,他于是想出一个办法,在各地召集国民党大会时,要左倾的站在左边,其余的站在右边,然后要他们相互打起来,这样站左边的受到了应得的惩罚。⁰

¹ 张国焘:《我的回忆》(二),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200页。

⁰ 张国焘:《我的回忆》(二),第207页。

我一直对张国焘此段回忆的真实性表示怀疑。不料当陈立夫回忆录出版后,发现张国焘这段带有几分传奇色彩的忆述,竟在陈立夫的回忆录中得到了印证。陈在回忆录中写道:“吴倚沧、我哥哥和我最关心的是如何找出谁是共产党,因为,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将他们党员名单交给我们过,因此,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分辨谁是共产党,谁是-纯粹-的国民党员, ,我告诉吴倚沧,唯一可做的就是打斗争,因为一打了起来,国民党和共产党两边的人自然就会分出鸿沟来。”¹ 笔者并不关注打斗争是否真能分出鸿沟来,感兴趣的只是当时两党党员的确难以分辨之情形。

在蒋介石严令整肃/共党分子,而/共党分子又难以分辨的情形下,注定这场声势凶猛的清党运动不可避免地将扩大化。日本东洋文库保存下来的一份清党文件中记载,在广州的一次清党中,军警将凡是穿西装、中山装和学生服的,以及头发向后梳的,统统予以逮捕。² 由于这场清党主要不是通过/党力进行的政治性清党,而是依藉武力展开的一场血腥的武装打压,手握兵器的武人比文职的党人可能更暴戾,也更毫无节制。在上海,清党委员会由陈群、杨虎二人负责,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无权过问。陈群将市党部的一名国民党/忠贞党员张君毅捕去,市党部虽一再向警备司令部交涉亦无效。张君毅最终被杀害。当时在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任组织部秘书的吴开先亲历了上海清党时的纷乱情形。他事后向陈立夫言及/无辜人民之遭害者不计其数,/言之至为痛心。”

南京国民党中央所定的清党目标,除了共产党人外,也兼及西

¹ 5成败之鉴:陈立夫回忆录6,台北,正中书局1994年版,第97)98页。

² 5国共合作清党运动及工农运动文钞6,日本东洋文库缩微胶卷。

» 5成败之鉴:陈立夫回忆录6,第104页。

山会议派和国家主义派。¹ 实际上,受清党打击的对象,远远越出了这一范围。除吴开先所言的/不计其数0的/无辜人民0外,一大批国民党人亦在这场运动中受到整肃。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即称:/清党运动发生以后,本党多数革命忠实份子却失其保障,随时有被土劣贪污构陷罗织之危险,其情形之悲惨,有如丧家之犬。0² /丧家之犬0形象地描述了当时一批国民党中下层党员人人自危的心态和境遇。如果说清党初期的武力滥化,是因为当局难以分辨打击对象不得已而为之的话,后续期的清党则几乎演变为一种当局失控的社会性行为。/共产分子0身份之模糊性与不易确定性,只会加剧这场运动的任意性和专断性。据当时报纸的密集报道,诬人为共,是最易制人于死地的/高招0。往日与人有隙者,诬人为共可以泄私恨;平常与人有利害冲突者,诬人为共可以除对手³;甚至索婚不遂,亦藉端诬人为共⁴。言行稍有不慎,/红帽子0即有可能临头。1928年4月10日至11日国民党5中央日报6连载一封题为5在下层工作同志的伤心惨绝的呼声6的读者来信,清楚地反映了当时国民党地方党员惶惶不安的情形:

本党不幸,为实际需要所迫而有清党运动之发生,致予贪污豪劣及投机腐化分子以乘机崛起,向革命势力反攻机会,凡属忠实同志,受其诬陷摧残,几至与共产党同归于尽,现在同志等均在腐化分子一网打尽之中,被殴辱者有之,被劫掠者有之,被杀害者有之,被诬告者有之,被缉拿者有之,被系狱者

¹ 参见黄金麟《革命与反革命》)/清党0再思考6,(台北)5新史学6第11卷第1期,2000年3月。

² 5苏省党部宣传部昨发表清党二周年纪念宣传大纲6,1929年4月13日5中央日报6。

³ 5罗贡华自述被捕的经过6,1928年3月28日5中央日报6。

⁴ 5中央最近处分党员案6,1929年6月22日5中央日报6。

有之。

正是清党运动中普遍存在的投机、专断、任意、武力、强暴等，在重创共产党的同时，也对国民党自残不浅。除部分国民党青年与共产党同归于尽⁰外，还有相当多的国民党员因清党而灰心、悲观失望，以至脱党。1928年江苏省党部举办国民党员总登记时，/党员对党灰心，不来登记者占十之三四；存观望登记者十之四五；因受反宣传不登记者十之二三。¹ 同样，广州市登记的国民党员不及全市原有党员的10%。广东全省申请登记者亦不过原有党员总数的35%。² 在汉口，清党前有党员3万多人，登记时仅5000人。”在长沙，清党前号称有党员19万，清党后仅剩下/合格党员01526人。这1500多名/合格党员0中，/农工两界寥寥无几³。清党前夕，国民党员总数号称100万，清党后，据1929年10月统计，减至65万。⁴

减少的30多万党员中，最有可能是一部分人：一部分是思想急进的城市青年学生党员；一部分是基层农工党员。前者有可能被清洗，后者有可能因恐慌而自动脱党。实际上，被清除和自动脱党者可能还不止30万。因为在大批农工党员脱党和左派青年被清洗的同时，又有数以万计的/投机分子0涌入国民党内。例如在成都，清党前原有党员仅3000余人，清党后申请登记者多达1万

¹ 5江苏省党务报告6, 1929年3月21日(上海)5民国日报6。

² 5广州市党务总报告6、5广东省党务总报告6, 1929年3月25、24日(上海)5民国日报6。

³ 5总登记报告书6, 中国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务指导委员会1928年编印, 文书类第10页。

⁴ 5长沙市之党员统计6, 1929年1月4日5广州民国日报6。

⁵ 5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统计处报告第2类第2号))) 党员统计(省市部分)6, 1930年, 出版地不详。

余人。四川全省清党后登记党员数愈 10 万,是清党前该省党员人数的数倍。¹ 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在清党工作报告中亦指出,各县/或党员甚多而登记极少,或党员极少而登记太多⁰,并称后者大半为/投机分子⁰。另据 1929 年(北平)5 民国日报6报道:河北/各县市指委中十分之九没入过党,有的是小土劣,有的当过税吏,有的曾做土匪,有的患神经病,其余确系不明白党义的盲从青年, , 这次河北党员的数量,竟以不过六千同志的数目而拉到二万七千之多。⁰

当时国民党内有人评曰:国民党/军事上虽得胜利,政治上却糟得不堪,土豪劣绅、投机分子潜形混入本党,冒充党员藉词诬害忠实同志比比皆是。武汉赤化,固属事实,而宁方腐化亦无可为讳。⁰民众对于本党的信仰,在这时间,可算剥蚀尽净!⁰”

对国民党而言,清党运动实际上是一场党内人才逆淘汰运动。一批对革命有信仰、有理想和有热情的党员受清洗,有的因致力于农工运动而被当作共产党惨遭杀害。如浙江豪绅地主/藉清党之名,谬指各地之宣传主张减租者为共产党员,向各机关告发。各机关于接受告诉之后,大事搜捕,至无辜受累者难以数计。^{0 1/4} 这等于提醒那些尚留在国民党内的成员,不要再以激进的方法来解决社会和经济问题。另一方面,那些藉党为私的投机腐化分子和土豪劣绅群相涌入或原封不动地留在党内。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在清党报告中写道:/反革命之势稍杀,不革命之势代兴。土豪借名清党,实施报复而图复燃。共党要犯逸走,忠实遭污,清浊不分,是非

¹ 5四川旅京党员对于川省党政的意见6、5四川党政情形6,1928年3月2日5中央日报6;谢作民:5四川的现状6,5中央党务月刊6第85期,1935年8月。

⁰ 适宜:5河北党务面面观6,1929年4月16日(北平)5民国日报6。

» 何民魂:5痛念与自惕6,1928年3月15日5中央日报6。

^{1/4} 洪瑞坚:5浙江之二五减租6,正中书局1936年版,第(68)69页。

颠倒。意志薄弱者视革命为畏途，感情热烈者，伤本党之无望，而投机腐化，纷至沓来，从而导致/ 党德沦亡，/ 党权日坠，/ 党机毁灭，/ 民众对党的信仰全失。¹ 1929年国民党/ 三大²检讨清党运动的得失时亦承认：清党的结果，/ 使本党起了一个很大的分化和损失，/ 一般投机腐化恶化分子都纷纷混入本党。³ 经过这样一场逆淘汰，国民党在孙中山时代遗留下来的革命精神消失殆尽。民众对国民党的信仰一落千丈。蒋介石承认：/ 清党时期，倏逾半年，共产党之逆迹固已大暴国中，本党之精神亦日见湮没。⁴”

清党的另一严重后果，是国民党的地方组织遭到极大破坏。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省以下地方党务多由共产党人/ 包办⁵。清党一起，国民党的地方组织首当其冲，很快陷入瘫痪状态。当时《中央日报》报道：/ 几个月来，党务受了不少的摧折，，各地的党务今日改弦，明日更张，停顿的停顿，攘夺的攘夺，完全沉入于阴晦悲观的景象中。⁶ 在地方党部中，省市党部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清党一起，原由共产党人控制的一些省市党部职位也就成了国民党各派觊觎的目标。为了打倒政敌，各派之间互相攻击对方为共产党。昨日刚以/ 共产分子⁷罪名置对手于死地者，今日又可能被其他的竞争对手以同样的手段打下去。地方党部今日改组，明日整理，你争我夺，互相倾轧，弄成循环报复的局面。省市县党部委员如走马灯一般轮换。《中央日报》社评写道：

在最近的这一年中，纠纷闹得最多和人员变换最频繁的，要算是这个省党部了。例如安徽一省，自去年3月到现在，为

¹ 江苏省党务报告，1929年3月21日（上海）《民国日报》。

² 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特刊第12号，1929年3月22日（上海）《民国日报》。

³ 蒋介石：《关于党务的提案》，1928年2月12日《中央日报》。

⁴ 《一周间的大事》，1928年4月1日《中央日报》。

期不过一年,省党部已经变更五六次;浙江一省也变更三四次;此外如湖北、湖南、江西各省也常有变更省党部的事情;而且每更换一次人员,就发生一次纠纷。人选愈趋愈下,党的威信亦因此发生动摇。弊害最大的,就是因为省党部变更频繁,互相争夺,演成甲兴乙起,丙去丁来的局面,致使党内无派别的理想不能实现。¹

由于各省党部纠纷不止,直到南京政权建立以后的第 6 个年头,全国建立正式省党部的省份还不到 40%,多数省区长期处于混乱失序之中。² 这一点,从战前省党部名称的不断变更亦反映出来,如救党委员会、整理委员会、改组委员会、指导委员会、维持委员会、筹备委员会、临时委员会、特别委员会、执监委员会等,频繁改换。蒋介石对此曾深有感慨地说:“中下级党部本为本党的基础,而今则朝易其人,暮更其名,互相抵拒破坏,使党外民众见之目眩,党内同志闻之痛心!”³

清党以前,国民党将自身组织的涣散归咎于共产党在国民党内分化所致,孰料清党以后,纠纷有增无减。在未分共以前的计划,只想把党的精神、党的组织权力作一整个的振刷运动。谁知分共以后,党的纠纷更多,党的威信尤见低落。自从清党以后,党的组织反日益涣散,党员不受党的支配,不受纪律的制裁,因之党的组织乃愈来愈涣散而几乎看不见党的整个行动和整个意志的表现。清党以后,共产党固然清了出去,但是党的纪律也似乎

¹ 雪崖:《5省党部的地位问题》,1928年3月30日《中央日报》。

² 《5民国二十三年中国国民党年鉴》,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印,第(丙)233) 241页。

³ 蒋介石:《5关于党务的提案》,1928年2月12日《中央日报》。

清除了。⁰¹

与省党部相比，县以下基层组织和党员受到清党运动的冲击似乎更大。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员多不愿下基层，基层组织多由共产党人主持。清党后，形势发生逆转，除极少数地方的县以下基层组织仍掌握在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手中外⁰，多数县以下基层组织成为土豪劣绅的天下。特别是两湖地区一大批曾被大革命洪流迎头痛击的土豪劣绅藉清党之机，沉渣泛起，乘机侵夺国民党基层党权。国民党在大城市主要依靠军队清党，而在省城以下的广大乡村社会，土豪劣绅自发成为清党的主力。清党为土豪劣绅提供了恢复其旧有权势地位并进而侵夺国民党党权的一次良机。5中央日报6社论写道：/清党达到我们目的了，但苏皖闽浙各地，土豪劣绅也乘时蠢起，捏词诬告本党青年忠实同志为 C. P.，从事农工运动者为共党，，忠实同志致遭残杀的到处皆是，信仰不坚被金钱软化堕落的更多。⁰”在湖南一些地方，自国民党宣布清党后，/土劣猖獗，变本加厉，百倍从前。凡曾在外游历，或曾加入本党，及此时留学在外者，无论是否纯洁，均以共党目之，或没收其财

¹ 张楚珩：5国民党与党员6，5三民半月刊6创刊号，1928年9月1日；5中央训练部开始办公6、5沪市执委会第6次纪念周6，1928年4月17日、1929年4月10日5中央日报6。

⁰ 在少数地方，因国民党清党未能彻底，基层组织在1927年4月以后的数年间仍为共产党人所掌握。如江苏启东县、福建莆田县、河南濮阳县、内黄县、河北蠡县等。见沈轶公等5忆两次国共合作中的国民党启东县党部6（5启东文史选辑6第3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启东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5年编印）；吴国钧5关于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莆田中共党员延期退出国民党问题6（5党史研究与教学6 1993年第3期）；谭世平等5中国国民党内黄县地方组织及其活动6（5安阳文史资料6第3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南省安阳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8年编印）；刘宪曾5回忆蠡县的国民党6（5蠡县文史资料6第2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蠡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1987年编印）。

» 何民魂：5痛念与自惕6，1928年3月15日5中央日报6。

产,或捉拿其家属。^{0¹} 在四川,清党前各地办党人员大多为/共党少年⁰;清党后,国民党四川省党部委派各县的团总或团练局长去填充/共党少年⁰被清洗后所留下的空缺。这些团总和团练局长均为土豪劣绅。他们/打着清共招牌,乘机混迹党部,陷害忠实同志,收买流氓地痞,实行招募党员,以造势力。^{0²} 在广东,/各县市党部自清党后,差不多都被不明党义党纪的腐化分子所包办,而且他们极尽其毒辣阴狠,排除异己的能事去诬陷忠实同志,弄到各县市执委几乎多于党员,如革命空气非常紧张的琼崖等处的县市党部,听说只剩下了寥寥无几的党员。不消说,党务亦陷入停顿的现象了。^{0³} 在江苏,/从清党后,八九个月来党的工作,差不多仅有很少数的健全下级党部,仅见到很少数的忠实而努力的同志,民众对党的信仰很微细,党领导民众的能力薄弱,甚至离开民众,甚至为民众厌弃,甚至做出危害民众的情事,有的是以藉办党以渔利,有的是以藉办党去争权利,去拉地位,甚至去勾结官吏,包揽词讼,欺侮民众,一般人批评党部几几乎变成衙门,热心的革命党员几几乎都变成新的土豪和新的劣绅。^{0⁴} 土豪劣绅的重新崛起,并对国民党基层党权的侵夺,使一个曾以/扶助农工⁰为职志的国民党迅速向一个新的军绅政权蜕变。

对国民党中央而言,土豪劣绅和投机腐化分子对基层党权的侵夺,显然非其发动清党的初衷。1927年5月5日胡汉民所提出的清党原则中,即声称/土豪劣绅、贪官污吏、投机分子、反动分子

¹ 5湘指委会防止土劣压迫青年⁶、5反动势力压迫下的湖南石门县⁶,1928年5月27日、6月15日⁵中央日报⁶。

² 5四川旅京党员对于川省党政的意见⁶、5四川党政情形⁶,1928年3月2日⁵中央日报⁶;谢作民:5四川的现状⁶,⁵中央党务月刊⁶第85期,1935年8月。

³ 5一月来的广东⁶,1928年4月7日⁵中央日报⁶。

⁴ 5江苏党务整理先声⁶,1928年2月4日⁵中央日报⁶。

及一切腐化、恶化分子，前经混进本党者，一律清除。¹ 按照胡汉民的设想，清党有两大目标：一是要清除共产党；二是要清除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和投机分子。胡汉民称前者为“恶化0”，称后者为“腐化0”。然而清党的结果，却是“恶化0已清，腐化0代兴”。

国民党清党反共和建国统一这两个过程是同步进行的。南京政权建立后，蒋介石面临的一个最大难题是“党权付托不到相当的人0”。因为共产党被清除后，国民党内“明了党义而能专心于党务者极少0”。蒋介石指责说：“清党后，各级党部的职员大部未曾受过训练，不明白党，不明白社会、国家、世界大势0，党员“犹之乌合之众0”。当时各省市党部给中央的报告中，也大呼党务人才奇缺。如在河南，“前省党部为共产党徒把持，自从新筹备后，党务人才几无法取求0”。在地方党权托付无人的情况下，国民党中央惟有听任土豪劣绅和投机腐化分子侵夺和分掠地方权力资源，在地方社会藉党为恶。另一方面，蒋介石鉴于清党后国民党“党力0”的严重虚脱和裂变涣散，更进而倚赖其武力的支撑，将军事力量直接转化为政治和社会的组织力量。

二、战前国民党的组织规模与组织基础

一般而言，一个政党执掌全国政权后，出于维持其政权统治的需要，以及执政党拥有丰厚的政治资源所具有的吸引力，其组织规模会呈现出急速膨胀的势头，以至于不得不采取某些措施来适度

¹ 蒋永敬编：《胡汉民先生年谱》，台北，国民党中央党史会1978年版，第394页。

⁰ 蒋介石：《整理党务计划案》，1928年2月12日《中央日报》。

» 5 河南省党务概况，1928年3月15日《中央日报》。

抑制其增长。¹ 而 1927 年执政以后的国民党,其情形却是另一番景象。

北伐时期,国民党的组织规模曾经历了一个急速扩充的过程。在 1924 年春至 1927 年春的 3 年间,国民党党员人数大约增长了 5 倍,即由不到 20 万,增至 100 万,其中国内普通党员约 60 万。经过清党,据 1929 年 10 月的统计,国民党党员总数减至 65 万余人,其中国内普通党员不足 27 万(见表 1)。

国民党执政后,其组织发展呈现出一个畸形的走势,即军人党员迅速膨胀,而普通党员缓慢增长。1929 年 10 月至 1937 年 1 月,国民党军人党员由 30 万增至 101 万。北伐战争初期(1926 年 10 月),军人党员仅占国民党党员总数的 4%,至 1937 年 1 月,这一比例上升到 61%。也就是说,在抗战前夕,几乎 3 名国民党党员中,就有 2 名是军人。

军人党员的膨胀,显示出战前国民党组织的军事化倾向。蒋介石非常重视在军队中发展党员。蒋的出发点是想通过增大军人党员在国民党党员中的比例,以军队的严密组织来改造国民党的松弛散漫。在蒋介石看来,古今中外最合理最严密的组织莫过于军事组织。蒋设想,要让涣散的党机器如军事组织一样严密有序,让每一个党员像士兵一样服从指挥。当军人党员占国民党党员总

¹ 俄共从 1917 年 10 月取得政权后,到 1922 年底,5 年间经历了两个迅速发展阶段和两次收缩。1919 年时,党员人数为 15 万,到 1921 年 3 月增至 75 万。中共执掌全国政权后,其组织规模的增长势头更猛。1949 年 10 月,中共党员多达 4481 8 万,到 1956 年 9 月/八大召开时增至 1073 万。1957 年以后中共宣布暂停吸收新党员,但据 1958 年的统计,党员人数又增至 1245 万。见 1 英 2 伦纳德·夏皮罗著、徐葵等译《一个英国学者笔下的苏共党史》(东方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60 页),及刘华峰、王雨亭主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工作大事记》(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390、474、507 页)。

数 60% 以上时, 蒋的/ 军队党化0和/ 党军队化0的设想似乎初步实现。然而, 数逾百万的军队党员并不是基于对党的意识形态的真正信仰, 而仅在形式上履行一道集体登记入党的简单手续而已。这种有名无实的膨胀数字, 无论是对党的组织力量, 还是对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 都毫无意义, 以至于考察国民党的组织规模时, 完全可以将其军队党员剔除在外。

表 1 战前国民党党员人数统计

年 月	国内普通党员人数	军队党员人数	海外党员人数	总 计
1926 10	425612	21589	97455	544656
1927 4	约 60 万			约 100 万
1928 3	约 22 万			
1929 10	266338	307568	79873	653779
1929 12	276028	402356	84333	762717
1930 10	274452	433942	84759	793152
1931 11	303353	459723	94852	857928
1932 12	358351	658530	98691	1115572
1933 12	394086	796352	104660	1295098
1934 10	435618	868939	104310	1408867
1935 9	468014	999685	106846	1574545
1936 5	498956	1002938	108228	1610122
1937 1	526977	1013019	110428	1650424

资料来源: (1)《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组织工作6, 台北, 中国国民党党史会 1993 年版, 上册第 85、89、101、106、160、176、280、311、329、367、410) 411、536) 537、570) 571 页; 下册第 55、93 页。(2) 杨幼炯:《中国政党史6, 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7 年版, 第 192) 194 页。(3)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

大会会议史料6上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214、255页。(4)5民国二十三年中国国民党年鉴6,第(乙)19页。(5)陈希豪:5过去三十五年中之中国国民党6,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第147)149页。(6)5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统计处报告第2类第2号)))党员统计(省市部分)6,1930年版,出版地不详。

注:国内普通党员含各省市党部和铁路、公路、海员、工厂、学校等党部所属党员;1930)1937各年度统计数内,含预备党员人数。

真正能代表国民党组织规模的,是普通党员的数量。1927年4月国民党国内普通党员约60万。经过一场清党运动后,到1928年3月,国内普通党员减至22万人。其后国民党普通党员人数缓慢回升。到1937年1月,国内普通党员增至52万多人,其中预备党员近16万,正式党员约36万。¹10年间仅增加了30万普通党员,尚未恢复到1927年/四一二0政变前的规模。

江苏、上海、江西、湖南、湖北、安徽等长江中下游省市是战前国民党直接控制的地区。而这些省区的国民党党员人数在战前几乎处于停滞甚至负增长状态。江苏、上海、湖北、湖南等省市1936年底的党员人数仅及该省清党前党员人数的半数左右。如湖北省1927年1月全省党员总数为31990人,而1936年底的统计为17233人;广东1927年5月全省党员总数为236605人,而1936年底的统计为80254人。²

如果进一步考察国民党党员与全国人口的比例,则可更加清楚地显示战前国民党组织力量的弱小。以1935年为例,是年国民党党员与全国人口的比例,约为1B300。若将有名无实的军队党员和海外党员排除在外,则这一比例为1B990,远低于同时期苏

¹ 5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组织工作6(下),第93页。

² 1927年湖北、广东的党员数,分别见5党务消息6,1927年1月10日5汉口民国日报6;陈季博5一年来广东之党务6,1929年1月1日5广州民国日报6。1936年的党员数,见表35战前国民党党员的地域分布6。

联、意大利等一党制国家中党员与人口的比例。做为一个执政党，战前国民党的组织规模实在太小。

表2 国民党等政党党员与全国人口的比例

年 度	政 党 名 称	党员与人口比例
1935	中国国民党(含军队和海外党员)	1B300
1935	中国国民党(不含军队和海外党员)	1B990
1934	意大利法西斯党	1B25
1934	苏联共产党	1B65
1958	中国共产党	1B52

资料来源：(1)1935年中国人口数引自5申报年鉴6(民国24年)，上海申报馆，第B)89页；1935年国民党党员人数引自5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组织工作6(上)，第570)571页。(2)1934年意、苏两党党员与人口比例引自鲁学瀛5论党政关系6(5行政研究6第2卷第6期，1937年6月)。(3)1958年中共党员与人口比例引自刘华峰、王雨亭主编5中国共产党组织工作大事记6，第507页。

表3 战前国民党党员的地域分布

年 月 地 区	1926 11 0	1928 12 12	1929 11 10	1932 11 11	1934 11 11	1936 12 12
广 州	12381	7575	10277		33330	17699
广 东	156915	55916	62775	88213	87202	80254
广 西	128394	7094	7199		5671	9195
福 建	3500	3600	7569	8223	6052	14488
湖 南	34400	13784	20958	16244	21087	21327
汉 口	1500	5610	510	4100	3309	4571
湖 北	30000	14920	16080	16185	12236	17233
江 西	1700	10869	20881	16513	15410	20746
安 徽		10187	11961	9715	7762	11902

年月 地区 人数	1926.10	1928.12	1929.10	1932.11	1934.11	1936.12
上海	2266	6203	6234	5691	5718	7712
南京	3225	5106	5563	14471	10514	9485
江苏	3200	14683	15508	12804	13473	17233
浙江	3223	12143	12530	23050	22791	30385
河南	2147	8020	8060	6246	24716	27277
北京(平)	4000	1843	1770	1400	2189	2285
天津		789	772	1161	1389	1450
河北	5300	17128	17128	12073	12325	12488
山东	4500	5106	7129	7233	7887	7445
山西	3200	6616	8047			8976
陕西	2179	77	1076	1367		7221
甘肃	513	2638	3576	3146	8672	11953
宁夏				306		1153
青海				283	838	2580
四川	8000	36981	77			19144
云南			509	7702	11266	7725
贵州	4000		451	8022	8189	4915
辽宁	385	1052	1675			6818
吉林	315	468	739			
黑龙江	340	225	365			
绥远	3600	1664	1787	1675	4024	4079
察哈尔	3200	2008	963	3326	3177	1996
热河	1120			506		
新疆						
内蒙	2109					247

资料来源: (1)5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 组织工作6上册,第79) 81、101)

104、122) 124、362) 366、436) 437 页附表、506) 507 页附表、558 页附表、608 页附表;下册,第 78 页附表、112 页附表。(2)5 民国十八年中国国民党年鉴6,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印,第 739 页。

注:1932) 1936 年各省党员人数含预备党员人数;1936 年辽宁项下的人数为东北三省总数。

北伐时期,国民党的地域基础主要是两广,其次是两湖。据 1926 年 10 月统计,两广(含广州)党员占国民党党员总数的近 70%,两湖(含汉口)约占 15%。这与当时国民党的控制地域和军事政治进程基本上是吻合的。国民党执掌全国政权后,其统治中心由珠江流域移到了长江下游地区。党员的地域布局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但战前党员的地域分布与南京政权的地域基础并不完全吻合。据 1935 年 8 月的资料显示,江浙两省(含上海、南京)党员占 1618%,湖南、湖北(含汉口)、江西、安徽、河南、福建 6 省党员合计占 2716%,两广(含广州)党员占 3111%,其他省区共占 2515%。据此观之,战前南京政权之核心的江浙两省(含上海、南京),其党员所占的比例相当低。即使再加上南京中央还有相当控制力的湘鄂赣皖豫闽等 6 省,其党员人数合计亦未过国民党党员总额的半数。另一方面,战前与南京中央分庭抗礼的两广,其党员人数虽较北伐时期大减,但仍占国民党党员总数近 1/3。战前国民党显然是一个组织基础非常脆弱的执政党。

国民党执政后,为什么没有出现一个急剧扩张其党势的高潮?

1929 年以前,国民党忙于清共和举办党员总登记,在此期间,为了防止/反动分子0和/投机分子0混入党内,基本上停止吸收党员。1929 年 1 月国民党/三大0决定实行预备党员制。/三大0修订的5中国国民党总章6规定,年龄在 16 岁以上,由两名党员介绍,经区分部党员大会通过,并经区党部考查及县市党部核准,方得为预备党员;预备党员受党的训练 1 年以上,年龄在 20 岁以上者,由

区党部考查合格,经县市党部审查及省党部核准,方得为正式党员。¹这是国民党自1924年/一大0实行直接吸收制以来,在党员吸纳机制上的一大调整。预备党员制度从1929年底开始在部分省市实施,最初国民党中央规定各省征收预备党员有一定的期限,一般为2)5个月,并非随时征收。²

从1932年下半年起,国民党中央要求各地党部开始大规模征求党员,改定期征求为随时征求。同时鉴于预备党员制有可能使一部分人因感到手续不便而不愿入党,又先后颁布了5免除预备党员程序办法6和5特许入党办法6,规定一部分人可以不经预备党员程序而直接加入国民党。特许入党和免除预备程序的对象,最初限定为/对党国有特殊贡献或劳绩者0和原为国民党员而未履行总登记者。其后特许入党和免除预备程序的对象日趋宽泛,乃至免除预备程序直接入党的人数,与经由预备程序转为党员的人数,几乎不相上下。

预备党员制度于1938年废止,前后实行不到10年的时间。这一制度仿自俄共,但与俄共相比,国民党的入党条件仍甚宽松。如俄共针对不同阶级的入党对象,规定不同的入党介绍人和预备训练期。而战前国民党的预备党员制仅在入党程序上多一道手续而已。

按理,作为一个掌控丰富政治资源的执政党,在入党限制不严的情况下,其组织规模会急速膨胀。而战前国民党除有名无实的军人党员与年俱增外,普通党员规模一直处于低幅滞长状态。

¹ 荣孟源主编:5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6上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663页。

² 5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报告6,5中央党务月刊6(三届三中全会特号),1930年3月。

1932年以后,国民党中央一再训令各省市党部加大征求力度,并按各省市人口和环境,规定应征党员数量指标,严饬各地方党部加紧努力不得怠忽。尽管所定指标不高,但各省市均未能按期如数完成中央下达的征求任务。如规定江苏、安徽、湖北、湖南、河北、南京、上海、北平等省市各应征3万人,河南、陕西各应征2万人,山东应征4万人,天津应征216万人。但直至1936年底,上述各省市均未完成指标。¹上海市党部为了广征党员,曾发表《告同志同胞书》,内称:“以本市而论,人口三百万中,党员仅万余人,约占全市人口三百分之一。以此少数之党员,领导漫无组织之群众,完成其偌大之使命,虽纵有三头六臂,恐亦难以奏效。事理至明,无庸讳言!且新陈代谢,庶万物能生灭不息,此项公律亦可适用于党之组织,若听任老分子之日渐淘汰,而无新分子加以补充,则数十年后党将不党,遑论事业,遑论革命,。经本会规定,每一同志须于本年九月以前,负责介绍新党员三人,以符三万人之预定数。望我同志即在本人之事业中、交游中、团体中、机关中、家庭中、亲友中,多方物色优秀分子,竭诚揽其加入本党。”²从这些广告式的话语中,不难觉察当时即使在上海这样的大都会中,市民群众加入国民党的热情也不高,以至于市党部为了完成征求指标而不得不采取某些类似摊派的措施。

战前国民党数量的低幅增长,至少与两个因素紧密相关:一是党组织松弛涣散,二是党与民众相疏离。由于党组织涣散无力,便不能有效地通过各级组织管道,自下而上大规模地吸纳新生力量。如1936年国民党中央在给地方党部的训令中指出:“各地党

¹ 5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组织工作6上册,第468页。

² 5上海特别市党部为征求党员告同志同胞书6,引自郑祖安5二三十年代上海市政府横向关系初探6,5学术月刊61994年第3期。

部办理党员之征求与晋升手续诸多迟缓,往往申请入党经年,尚未领得预备党证,或预备期满已久,尚未晋为正式党员,向地方申请入党者积年累月,尚不能得一预备党证。¹而党与民众相疏离,则民众对党失去信仰,党对民众失去吸引力。党的组织来源因之枯竭。

战前国民党的地方党组织建设滞后于地方政权的建设。直至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以后的第6个年头,仍只有不到40%的省份建立了正式的省党部,不到17%的县成立了正式的县党部。即使在国民党党务基础较好的长江中下游省份,县党部亦未能普遍建立。据1933年底的统计,江、浙、湘、鄂4省分别只有73%、69%、54%、42%的县正式成立了县级党部。²县以下农村基层社会则几乎不见党组织和党员的踪影。如1931年程天放在考察河南省国民党党务后指出:“河南全省党员总数,在1928年总登记时只有8000人,经过18、19两年的变乱,淘汰了许多,现在只有6000余人,党员不但数量少,并且往往集中在县城内,有许多县分,乡村里面一个党员都没有。”³这种情形不独河南一省为然。从各省市国民党党员与人口比例观之,除南京、汉口、上海、北平、广东、浙江等省市低于1B1000外,江西、广西、福建、山西、河南、湖南、湖北等省都在1B1000以上,江苏、河北、四川、安徽等省则在1B2000以上,山东、陕西等省则平均5000)9000人中才有一名国民党员。这些为数不多的党员主要集中于城市,只能在城市的上层可以看到,农村中是很难找到党的势力的微弱影响;⁴不但在农民中很难找到党员,并且在一切农民运动负责人员中,在地方自治工作人员

¹ 5指示防止重复入党办法六点,5中央党务月刊6第97期,1936年8月。

² 5民国二十三年中国国民党年鉴6,第(丙)233)241页。

³ 程天放:5河南省之党务6,5中央党务月刊6第33期,1931年4月。

中,在农村文化教育负责人员中,以及农村经济建设负责人员中,都不容易看到党的踪迹¹。战前国民党组织基本上未深入到县以下乡村社会。

表4 战前部分省市国民党党员与人口比例(1935年)

省 市	党员与人口比	省 市	党员与人口比
南 京	1B59	山 西	1B1288
汉 口	1B186	河 南	1B1321
上 海	1B510	湖 南	1B1429
北 平	1B664	湖 北	1B1775
广 东	1B417	江 苏	1B2199
浙 江	1B722	河 北	1B2280
江 西	1B1005	四 川	1B2611
广 西	1B1098	安 徽	1B2786
福 建	1B1288	山 东	1B5119

资料来源:(1)各省市人口数引自5申报年鉴6(民国24年),第B87)89页;部分省市党员人数引自5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组织工作6上册,第608页附表。

战前已成立县党部的地区,其组织运作情形如何?据1930年江苏省党部的调查,各县党部不健全者甚多,委员与委员冲突,下级与上级反对,政府与党部倾轧,纠纷叠起,怪象百出⁰。全省各县党务分为两类情形:一类是/可工作而不工作⁰;一类是/要工作而不能工作⁰,结果是/无一好好做工作的县党部⁰。⁰1934年1月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工作报告中亦谈到,江苏省不仅省党部派系斗

¹ 何汉文:5如何树立党在农村中的基础6,5中央周刊6第1卷第30期,1939年3月2日。

⁰ 1930年8月20日(上海)5民国日报6,/党务⁰。

争激烈,各县党务亦时起纠纷,党员党籍十分混乱。国民党中央不得不训令江苏各县党部一度/停业整顿。¹

在安徽,一些县党部空有招牌,并无实际活动。1935年,中央政治学校学生陈少书在安徽实习调查时发现,安徽各县党务,以经费关系,许多县份均在紧缩中。县党部只设干事、书记各1人。如当涂县党部干事还不是专职,党部平时无人办公。²

江西是国共两党武力对峙的核心地区。蒋介石希望该省各县党组织能积极配合他/剿共,然而,蒋在1933年11月的一次演讲中谈到:“现在江西各县的党务,我看就太幼稚,太不行了,不仅是不能做什么实际工作,协助剿匪,就是连贴标语的工作也都不会!”³

在那些处于半控制或只在名义上/奉国民党正朔的边缘省区,国民党的组织基础自然更为空虚。在这些省区,地方实力派抵制和抗拒南京国民党组织力量的扩张和渗透,有的明令禁止国民党党部组织在其控制区域合法存在;有的表面上允许国民党在其省区建立党部组织,而暗地里严加防范;还有的地方实力派利用国民党的招牌,发展忠于自己的组织力量。

东北易帜后,张学良与南京中央围绕什么时间建党、如何建党以及由谁来建党等问题,展开了长达数年之久的颀颀和较量。张学良最初试图抵制、拖延,继而又力图将建党权和党部领导权掌控在东北集团之手,最终使东北国民党组织实际处于空洞化和停滞

¹ 5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组织工作6上册,第482页。

² 陈少书:5镇江、当涂、和县实习调查日记6(1935年),萧铮主编:5民国20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6第166辑,台北,成文出版社1977年版,第83717页。

³ 蒋介石:5革命成败的机势和建设工作的方法6,张其昀主编:5先总统蒋公全集6第1册,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版,第800页。

化状态。¹

在山西,自1930年蒋、阎、冯大战以后,山西省党部撤离太原约1年之久。其后,以CC派为代表的山西省党部一度在太原恢复活动。但1931年底省党部因镇压学生抗日运动激起公愤而再度关闭。阎锡山趁机抵制南京中央CC系省党部再回太原。从此,山西境内没有国民党的公开组织活动,直到抗战中期,国民党中央与阎锡山达成初步谅解后,山西省党部才又恢复。²

国民党在山东的遭遇也大致相似。韩复榘为了发泄对南京中央的不满,曾于1932年前后将国民党山东省党务负责人加以逮捕。1935年山东黄河发生水灾,韩复榘趁机将全省73万党费移做赈灾,并下令停止各县国民党党务活动。南京中央所委派的省党部被迫转入地下。直到抗战爆发,韩复榘被蒋处死后,山东省党务才恢复活动。”国民党在东北和华北的地方组织活动,除受到地方实力派的抵制和排拒外,亦受到日本侵华势力的打压。1931年/九一八以后的东北和1935年何梅协定以后的华北,国民党组织几乎销声匿迹。

与东北与华北相比,西南的情形略有不同。在1936年以前,两广一直与南京中央处于分立割据状态,不仅政务上成立西南政务委员会自树一帜,党务上亦建立了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西南执行部,自征党员,自成一系,不受南京中央党部的统属和节制。广西还另外成立了一个独立的政党组织,名为/三民主义革命

¹ 尾形洋一:《易帜后之东北国民党之活动》,《中国关系论说资料》,17)4(上),1975年;郭正秋:《东北地区国民党组织的建立与蒋张关系》,《史学月刊》2000年第3期。

² 李冠洋:《中国国民党山西省党部简述》,《山西文史资料》第13辑,1979年。

³ 张玉法:《抗战时期中国国民党在山东的党务活动》,《国父建党革命一百周年学术讨论集》第3册,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版。

同志会0,后改称/中国国民党革命同志会0,李宗仁和白崇禧分别任会长和副会长,亦以民主集权制为组织原则,以分部为分支机构,以小组为基层组织。¹胡汉民则于1932年5、6月间成立了一个名为/新国民党0的秘密政党组织。胡自任主席,邹鲁任书记长,并建立了自己的中央和地方组织。²在秘密的/革命同志会0/新国民党0和公开的/西南执行部0、西南政务委员会的明暗配合下,两广对南京国民党中央形成了组织严密的反制体系。战前两广国民党党员虽占国民党党员总数的1/3,但在1936年以前,南京中央对西南国民党党务基本上处于失控状态。如国民党四届三中全会的组织工作报告中即提到:/广西党务,停顿已久,其进行情况,向无呈报,省党部负责人员,亦无从查考。0³

党员数量和地域分布的局限性,以及地方组织基础的脆弱性,均显示出战前国民党是一个/党力0十分衰微软弱的执政党,其党务组织形态大致呈现出/上层有党,下层无党;城市有党,乡村无党;沿海有党,内地无党0的格局。

三、战前国民党员的社会构成

在西方议会政党体系中,党员的地位和作用并不引人注目。党员除在选举中投下自己的一张选票外,并无其他特别的权利和义务。选民对党籍并不看重。政党发展党员的目的,也主要是多拉选票,扩大影响,故对发展党员一般没有严格的标准和手续。如

¹ 参见5中国国民党西南党务年刊6,中国国民党西南执行部1933年编印;程思远5政坛回忆6,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1)71页。

² 参见杨天石5寻求历史的谜底6(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71页;5海外访史录6(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51)354页。

³ 5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组织工作6上册,第423页。

美国两大政党的大多数党员都是不固定的,也没有履行过任何手续。普通选民只要在选举时投某党的票,即被认为属于某党的党员。故从严格意义上讲,这些政党的成员大多是政党认同者,而不是真正隶属和忠于某党的党员。仅从党员的社会构成上很难判断某个政党的阶级属性和政治倾向。故一般西方政党政治的研究者不太注重对党员群体的研究。¹

中国国民党则不同,其组织体制借鉴苏俄列宁主义政党组织模式。在革命党的政治文化中,党要求党员在普通民众中起先锋和模范带头作用,引导民众接受党的意识形态,驯服于党的领导。如国民党声称其党员是/训育0民众的/保姆0,其党歌歌词中亦要求党员/咨尔多士,为民先锋0。国民党/党员守则0更要求其党员大要知/忠孝0、/仁爱0、/信义0、/和平0,小要讲/礼节0、/服从0、/勤俭0、/整洁0,还要懂得助人为乐、持之以恒以及学问济世等道理。²此外,国民党在各个时期还具体规定党员对党应负的责任和义务。如1935年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为15种不同职业的党员分别规定其对党应负的责任,要求党员在各界群众中成为核心。”故在法理上,国民党对其党员寄予了甚高的期望,有别于西方议会政党对其党员的低要求。

由于国民党自称是/全民利益0的代表,同时又要求其党员做全民的/先锋0,故在党员吸收上,一方面表示不偏重某一阶级,另一方面又特别注意吸纳和网罗社会各界的/精英0和权势人物。如1936年6月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通告各省市党部,规定下列6种人

¹ 参见李景治5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制度6(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0)56页。

² 中国国民党党歌和中国国民党党员守则,见李云汉5中国国民党史述6第1编,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会1994年版,文前插图。

» 5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组织工作6上册,第584页。

员无论对/党国0有无贡献,均可免除预备党员程序径升为正式党员:各级学校校长和职员;县以下基层行政人员,包括区长、乡镇长及保甲长;公民训练中的各级干部;各类党政训练班的学员;各社会公益团体的负责人;各职业团体的负责人。¹ 这意味着国民党不是培养党员成为社会各界的楷模,以赢得民众的信仰和拥护,而是网罗原有的社会权势人物或具有权势潜能的人加入国民党,以达到渗透和控制社会各阶层民众的目的。

战前国民党普通党员,主要来自城市知识界和政界。知识界主要有教师、青年学生和自由职业者。这三类党员合计约占国民党普通党员总数的1/3以上。政界主要指党政机关人员。这一部分约占国民党普通党员人数的1/4到1/5。这个时期国民党员的职业构成,缺乏全面完整的统计资料。从部分省市的党员统计数字看,战前国民党员的职业构成与北伐时期相比,最明显的变化有二:一是知识界党员中,教师占有较大的比例,而青年学生所占的比例明显下降。如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0时,湖南、河南、山东等省国民党党员中青年学生所占的比例分别为50%、70%和40%,到1929年3月国民党/三大0时,三省学生党员的比例分别降至14%、19%和14%。² 1934年,湖南国民党党员中学生比例更降至71.5%。北伐时期青年学生争相加入国民党的情景不复再现,表明执政以后的国民党对那些富有革命激情的青年学生已失去了吸引力。这个时期教师党员的增加,可能大多出于谋职的现实考虑。因为在教育/党化0的口号下,一些地方限制非党员从事教职,或强制教师集体入党。

¹ 5中央组织部函各省市铁路党部6,5中央党务月刊6第95期,1936年6月。

² 久保亨:5南京政府成立期N中国国民党))) 1929年N三全大会r中心K6,5研究6第31卷第1号,1984年4月。

二是政界党员比例明显增加,而农工党员比例明显下降。如广州市在国民党/二大0时,工人党员占60%,政界党员占10%,到国民党/三大0时,工人党员降至16%,而政界党员则上升至46%。广东省国民党员比例在1926年10月统计时,农民约占40%,学生和工人各占25%,商人不足10%,其余军、政及自由职业者甚少;到1929年3月统计时,农民占17%,工人占11%,学生占9%,商人占12%,教师占11%,党政军警占16%,其余及不详占24%。¹

农工党员比例的骤减,是国民党清共以后与农工乖离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战前国民党官方统计中的农工党员,已不是北伐时期/扶助农工0概念中的/农工0。这个时期国民党所称的/农0和/工0,既不是阶级阶层的分野,也不完全是职业的分野,而是以生活和工作的地域场所来划分的一个十分含混的概念。如/农界0、/农业0的分类中,既包括地主(/业主0),也包括小农(佃农、雇农、自耕农等);/工界0、/工业0的分类中,既包括资本家(/厂主0),也包括工人。以江西为例,1934年该省国民党党员分类统计中,/农业0(含林渔牧)党员共计900人,其中/业主0668人,/助理0157人,/雇工075人;/工业0党员共计56人,其中/厂主027人,/职员029人。²这意味着,在江西省的战前党员中,真正的农民和真正的工人甚少。

据1934年中共党员成份统计,农民占87%,工人占51.8%”³,

¹ 5中国国民党广东省执行委员会各部工作报告6,广东省国民党党部1926年编印;久保亨:5南京政府成立期N中国国民党))1929年N三中全会r中心K6,5研究6第31卷第1号,1984年4月。

² 5中国国民党江西省党务统计报告6,中国国民党江西省执行委员会1934年编印,第21页。

³ 5中国共产党之发展及其没落6,作者及出版时地不详,第397页。

与国民党党员的社会构成判然有别。中共主要以社会底层民众为政治动员对象,而国民党则以社会中上层/精英⁰为基本组织力量。这一点从战前国民党党员的教育程度亦反映出来。大约有近一半的党员受过高等和中等教育,近 40% 的党员受过初等和私塾教育,未受过教育的党员不到 10%。以 30 年代华中地区的经济和教育水平为例:家有良田 30 亩,才能供给两个子弟入小学;家有良田 50 亩,才能供给一个子弟进城读高小;家有良田 200 亩以上,才能供给一个子弟读初中。¹ 以此衡量,国民党党员大多数是家有恒产、受过良好教育的中等以上社会阶层。

表 5 战前国民党员的职业构成

年度 职业 百分数	1929 (全国)	1931 (浙江)	1932 (河北)	1932 (南京)	1933 (江西)	1933 (江苏)	1934 (湖南)
农	101 4	171 8	201 9	01 2	61 5	141 3	81 1
工	71 3	21 6	11 2	01 4	31 4	11 6	31 2
商	81 3	151 2	51 2	21 5	151 5	111 2	51 4
公务	191 8	171 1	151 8	511 9	231 7	271 8	171 4
学生	101 5	51 8	61 0	171 4	51 1	21 4	71 5
教育	211 3	321 4	311 8)	241 8	291 4	351 5
自由职业	11 6	01 9	31 4	11 8	21 7	31 6	11 5
失业	01 5)	41 3	51 0	51 1	91 7	81 4
其他	71 1	81 2	11 7	01 1	51 6)	41 6
不明	151 1)	91 6	201 5	71 6)	81 3

¹ 参见拙著《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 1872) 1949》,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69 页。

资料来源: (1)5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统计处报告第2类第2号)) 党员统计(省市部分)6。(2)5民国二十三年中国国民党年鉴6,第(乙)21页。(3)5中国国民党湖南省第三届执行委员会报告书6,中国国民党湖南省党部1934年编印,第(组)146页。(4)赵如珩编:5江苏省鉴6,新中国建设学会丛书,1934年,第61)66页。

注:/ 公务0项包括党务、政界、军警;/ 学生0项有的内含无业。

表6 战前国民党的教育程度

教育程度	1929 (全国)	1932 (湖北)	1934 (江西)	1936 (浙江)
留学/大学	713	316	217	218
专科教育	1914	614	1117	914
中等教育	1914	2317	3117	2414
小学教育	2019	2712	2617	3115
私塾	1412	1413	1217	2219
未受教育	715	2114	615	516
不详	1019	313	712	313

资料来源: (1)5民国十八年中国国民党年鉴6,第751页;(2)5中国国民党湖北省党员统计报告6,湖北省档案馆藏,LS66/2/60/3;(3)5中国国民党江西省党务统计报告6,江西省执委会1934年刊印,第18页;(4)5中国国民党浙江省党务概况统计表6,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722/677。

在中国传统社会,皇权通过科举等政治吸纳机制将绝大多数读书人紧紧地吸附和控制于体制之内。只有极少数落第失意者隐逸民间,漂游于体制之外,很难形成群体性的反体制力量。科举制度废除后,新知识分子已不像传统士大夫阶层那样有着高度一致的意识形态认同和学而优则仕的单一职业取向。读书人作为一个社会群体,不再天然地融附于政权体制之内,而裂变和分离出一大批体制外知识分子和反体制知识分子。国民党从同盟会至1927

年以前,其主体即是一批反抗现存政治体制的知识分子。北伐完成后,国民党由一个反抗现存体制的革命党转变为一个代表现存体制的执政党。在国民党统治下,中国知识分子依其政治取向,依然可以划分为现存体制的支撑群体、反对现存体制的对立群体以及与现存体制保持距离的中立群体。国民党虽然吸纳了一大批知识分子进入其政权体制之内,而游离于国民党体制之外的知识分子仍占大多数。

四、战前舆论对国民党的观感

北伐时期国民党虽不如共产党激进,却仍称得上是一个富有奋斗精神的革命党。有理想有志向的知识青年群相涌入。胡适即称:/民十五六年之间,全国多数人心的倾向中国国民党,真是六七十年以来所没有的新气象。¹胡适所称的/全国多数0,当主要指知识精英群体。正是他们所形成的社会舆论,往往被视为/人心所向0的表征。而知识精英中真正倾向国民党的,又主要是青年知识分子。

1927年国民党清党反共无疑在共产党人心中埋下了刻骨仇恨的种子,也在激进的青年知识分子心目中投下了恐怖的阴影。不过当时也有像蔡元培、吴稚晖等国民党元老兼名流学者直接参与了这场清党运动,可能为蒋介石赢得了一定的社会道义基础。胡适谈到,当时北京的一些青年大学生,非常崇拜蔡元培等学者教授,他们不相信支持南京清党的蔡元培和吴敬恒也会做坏事。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清党之际,胡适正由美返国,途经日本时,一位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向他询问蒋介石清党真相。胡告之曰:/蒋介石将

¹ 胡适:5惨痛的回忆与反省,5独立评论6第18号,1932年9月18日。

军清党反共举动能得著一班元老的支持,你们外国朋友也许不认得吴敬恒、蔡元培是什么人,但我知道这几个人,很佩服他们的见识与人格。这个新政府能得到这一班元老的支持,是站得住的。¹但胡适的看法,只是清党之际的一种即时性的预测和当下观感,实际上,当时有多少青年学生如胡适所说的那样,因为崇拜蔡元培、吴稚晖而认同蒋介石清党,实很难说。一般知识分子大约极少有不反对的。如号称与吴稚晖有忘年之交的曹聚仁即毫不客气地指责吴氏/助纣为虐²,是/社会革命的叛徒³。一向态度平和的周作人看到许多/青年朋友的横死⁴,而且大都不是死于战场,而是/死在所谓最正大的清党运动里⁵,亦感到南京新政权与北京旧政权并没有多少不同。胡适本人在明了清党真相之后,对国民党的看法也逐渐发生了改变。⁶陈立夫直到晚年还慨叹:清党/对本党之失去学界同情及一般人民之失望,均属无可补偿之损失也⁷”。

尽管如此,在南京政权建立之初,部分从北洋政权下过来的知识分子对号称要继承孙中山遗志的国民党新政权还是抱有希望和幻想的。他们认为,国民党总比北洋军阀具有现代知识和政治抱负,故而期望国民党能建立一个现代化的新政府。时任南开大学教授的何廉曾记录下他当时的感想:/我们住在北方,我却真心实意地拥护南京政权,例如1928年,我、蒋廷黻和几个朋友从天津到南京。我们在南京见到新国旗时是多么激动呵!对我们来说,那

¹ 引自吴相湘《胡适但开风气不为师》,《民国百人传》第1册,台北,传记文学社1971年版,第153页。

² 参见罗志田《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43)249页。

³ 《成败之鉴:陈立夫回忆录》,第104页。

或许是一个伟大新时代的象征。¹ 在那时/北方学统⁰的知识分子中,怀着与何廉同样感想的也许不在少数。

但知识界对国民党的期望和好感未能持续多久。1930年5月5日北华捷报⁶有文这样写道:/仅仅在一年半之前,人们还满怀热情,而今天,在所有中国人中间都存在绝望感,这是最糟糕的现象。⁰ 5北华捷报⁶的看法并非独家之言。下面这段话出自30年代初福建闽侯县国民党县党部的一份内部报告。报告坦陈了当时普通民众对国民党观感的变化过程:

闽省自隶党治之初,民众视党如天之骄子,视党员如神圣之不可侵犯,其所以如是者,盖以水深火热之民众,待援之殷,望治之切,视党军如王师,视主义如圭臬,视标语如信符,党军未至,尝有奚为后我之怨,其信仰之深可知矣。惟时过境迁,办理党务者不能奋发有为,遂流于腐化;益以时会所趋,党权不能提高,于是党治渐移为官治,致贪污充斥,民苦难堪,而负有除暴救民之党部负责同志,在此之时,只以息事宁人为口禅,虚与委蛇,徒事敷衍,此民怨沸腾矣。至党员方面,平素久疏训练,对党观念,本已薄弱,况多不能洁身自爱,行动流于恶化,其作奸犯科,如嫖也,赌也,鸦片也,贪污土劣也,溺者无一不尽其极,1职2是之故,人民对党之信仰,则每况愈下,此不特过去本县如是,即全省各县人民对党之态度莫不皆然。”

闽省初隶党治之时的情景,颇能反映中国普通老百姓最初对/党⁰和/党人⁰的认知心态:视党义如圭臬,视党军如王师,视党人

¹ 引自易劳逸《流产的革命》,第11页。

⁰ 1930年5月20日北华捷报⁶,第297页,引自费正清主编、章建刚等译《剑桥中华民国史》(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53页。

» 朱宛邻编:《福建省党务概况》,福建省特派员办事处1935年印行,第22页。

为天之骄子。然而时过境迁,民众对国民党的热情、信仰和期望很快随着国民党的腐化无能而归于幻灭。国民党人的形象和威望在北伐后短暂的两三年间急转直下。30年代初期国内新闻媒体不乏此类相关报道。如1932年天津5大公报6发表社评曰:/国民党自执政以来,党员未必加增,新加入者,其目的或只在求官,而倔强不羁者,或不满现状而去。各地办党务之人,得意者易腐化,失意者易消极。多年之党人风度,能保持者少矣!¹ 5时代公论6更直言不讳地指出:/国民党弄到现在,结果是天怨人怒,成为众矢之的,四面楚歌,大有不能自拔之势!好像街谈巷议,茶余酒后,大家都是不以国民党为然。²该文作者杨公达以自己在教育界的亲身体验断言:/我敢以历年在教育界的观察说一句:没有一个大学里,有数多的教授和学生,同情于国民党的;没有一个比较努力的国民党同志去做大学校长,学校不发生一个不可收拾的风潮的。³ 杨公达时任中央大学法学院院长,是5时代公论6的创办人。杨本人此时是否是国民党党员,尚待考,但从其1年之后出任立法院立法委员,抗战爆发后又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等职推测,杨大约可以归属于体制内知识分子之列。杨对国民党的上述感言,显然不是一位反体制知识分子的过激宣传,而像是一位体制内知识分子的肺腑诤言。同年,杨还和另外两名作者在5时代公论6上联名发表文章,痛切指陈国民党党员的/四化0现象:/现在国民党党员的全体,大多数是腐化,次多数是恶化,再次多数是软化,余则不问党事的消极化。说到精锐的党员,直是凤毛麟角,求之不得0;/盖以国民党的各级党部,数年来,因为领导人的不良,在各地方实是引起

¹ 5论保障政治自由之亟务6,1932年4月30日天津5大公报6社论。

² 杨公达:5国民党的危机与自救6,5时代公论6第4号,1932年4月。

人民的反感不少,痛快地说,简直就是深恶痛恨!0¹

北伐时期一度倾向国民党的胡适,此时也改变了自己的看法。1932年9月5日独立评论6发表胡适一篇题为5惨痛的回忆与反省6一文。胡在文中总结国民党执政以来四五年的转变说,国民党在北伐时曾得多数人心的拥戴,但执政后, / 这个新重心因为缺乏活的领袖,缺乏远大的政治眼光与计划,能唱高调而不能做实事,能破坏而不能建设,能钳制人民而不能收拾人心,这四五年来,又渐渐失去做社会重心的资格了。0

1933年,5国闻周报6有评论坦白申言:/民众不再掩饰对国民党的厌恶。0² 1935年5日独立评论6刊文批评国民党党工人员素质太低,形象太差,各省市党部负责人大多平庸,以至/这几年来,大家对于党部以及党务工作人员,谈起来都有点头痛,嬉笑怒骂之声,时不绝于耳鼓,冷嘲热讽之词,常流露于报端0³”。蒋廷黻更将国民党与德国国社党进行比较,认为国民党与国社党的党治理论和组织体制都是抄袭苏俄的,但两党在精神上及力量上简直有天壤之别。 / 在德国,国社党是个大有力的发动机,在我们这里,国民党的党员都不好意思公开的承认自己是党员。0⁴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期蒋介石亦毫不掩饰其对国民党的失望和懊恼。从30年代初开始,蒋在公开和私下场合接二连三地对国民党党人和党务进行严厉的批评。1930年10月,蒋在一次讲演中谈到:/现在一般人看见我们的党员,就是类似一个特殊阶级, , 特殊阶级是没有什么不讨厌,不排斥的。0/讲得不好,就是如

¹ 孙佐齐、平凡、杨公达:5关于党部组织简单化6,5时代公论6第13号,1932年6月。

² 刘振东:5中国出路问题6,5国闻周报6第10卷第24期,1933年6月19日。

³ 贺岳僧:5论改良党务工作6,5独立评论6第173号,1935年10月。

⁴ 蒋廷黻:5国民党与国民党党员6,5独立评论6第176号,1935年11月。

同军阀一样,再讲不好一点,就是如同乡下劣绅一样。⁰我所到的地方,所接近的社会,一般对于我们党部党员的影响印象,均是非常不好,没有一个地方的人,讲我们党部曾为人民打抱不平,为民众求利益的;所讲的话,统统是同人家争权利,做包庇词讼的贪污纳贿的事情。⁰现在一班社会人士看见我们党部所在的地方,若同从前看见旗下满人一样。⁰蒋在另一场合更直截了当地说: /就党外一般人士,尤其是各党各派对于我们的观感来说,他们看我们党部就是衙门,看我们党部委员就是官僚,看我们一般党员当作特殊阶级,甚至视同亡清时代的旗下人。⁰一般民众不仅对党无信仰,而且表示蔑视。⁰

这种直露坦率的批评并非蒋偶尔发出的感慨。查阅 30 年代蒋的相关文集,类似的言论屡见不鲜,而且批评的语调有日趋严厉之势。1932 年蒋介石甚至申言: /中国革命已经失败了!⁰我现在唯一的愿望是恢复中国国民党 1924 年的革命精神。⁰” 1933 年蒋进一步指责党已经 /破碎⁰、无能⁰、失信用⁰。他举江西为例: /江西各县的一般党员,因为一方面极其幼稚,一方面又领导无方,不仅是不能实际协助剿匪,正如现在各地方的警察一样,不仅不能尽到职责,以维持公共的安宁,增进社会的福利,而且反要为非作歹,包烟包赌,做出种种坏事,不仅不足以为一般国民的模范,来指

¹ 蒋介石:《讨逆胜利后本党之重要关头》(1930 年 10 月 20 日),《中央党务月刊》第 6 卷第 27 期,1930 年 10 月。

⁰ 蒋介石:《唤醒党魂发扬党德与巩固党基》(1939 年 1 月),《先总统蒋公全集》第 2 册,第 1215 页。

» 引自易劳逸《流产的革命》,第 12 页。

^¼ 蒋介石:《革命成败的机能和建设工作的方法》(1933 年 11 月 14 日),《先总统蒋公全集》第 1 册,第 799 页。

导并感化一般的人民,且本身就立不象立,行不象行, , 0¹ 蒋介石这些措词严厉的训话,也许含有激励国民党人奋发自励的良苦用心,但也确实反映了当时国民党组织危机的严重性和国民党员社会形象的恶劣程度。

蒋认为在北伐军事胜利以后,国民党又重蹈了辛亥革命的覆辙。他指责国民党人不仅没有负起革命的责任,相反在执掌政权后, / 因循弛懈,蔑视党纪0的积弊重新暴露出来。党丧失了革命精神,不成其为一个革命党。蒋为此深怀忧虑,并一再提请国民党人注意。1935年蒋在国民党/五大0闭幕后的一次讲话中,再次痛切地指出:

外国有革命党,我们中国也有革命党;何以外国的革命党能够建国,能够成大功;我们有革命党,国家现在还是这个样子呢, , 我以为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一般党员办事不负责任,没有精神,不能自动努力来研究改善与创造一切以报效党国, , 现在国家如此危急,如果本党不能及时振作,领导全国国民起来共同救国,我敢说党和国家决不能再苟安三四年!眼看人家就要来摇动我们党国的基础!我们的党和国家就要灭亡!

在蒋介石痛切谴责国民党的同时,另一位国民党领袖胡汉民亦持有大致一致的看法。1930年,胡汉民尖锐地批评基层党部不愿做实事,更不愿与民众接近。 / 许多党部都不知向下层去做工作,却只会向上面拱,只对上级党部上条陈、下批评,说你们应该怎

¹ 蒋介石:5革命成败的机势和建设工作的方法6,5先总统蒋公全集6第1册,第800页。

⁰ 蒋介石:5如何创造党国的新生命6(1935年12月23日),秦孝仪主编:5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6第13卷,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会1984年版,第604)605页。

样怎样,而对于自己应该向人民方面做的工作,却不知考察,不知注重。⁰所谓-到民间去。在党员已成了一句空话。¹胡在1931年初的一次讲话中进一步声称:/目前我们党的生气,似乎一天一天在那里销沉了。⁰很多人说国民党从前固凶,现在更凶了。何以呢?因为从前国民党包办一切,不许人家来染指,现在则包而不办,形成一个特殊阶级。这几句话,很显出了国民党党员不能深入民众,并已经丧失了革命精神的意义。⁰

胡和蒋一样,对国民党党部和党员指责最多的,就是党部衙门化,党员官僚化。在胡和蒋的理想中,党部和党员应该是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桥梁和纽带,一方面能协助政府推行政令,教导和训练民众;另一方面能将下层民众的意见和不满上达给政府。胡、蒋期望于地方党部和党员所担当的,正是传统士绅所扮演的/通官民之邮⁰的中介角色。国民党中央规定,下级党部不必要挂出什么招牌来,表明那里是党部,以免叫人民看到党部也是一个官府机关而不愿和它接近。”各级党务人员不归入公务员系列,其官俸不称官俸而称作/生活费⁰,其官等亦区别于普通公务员,不分特、简、荐、委,而称首长、处长、科长、干事。^{1/4}凡此,皆有意淡化党务人员的官僚色彩,希望将国民党党员塑造成为民间精英的角色。

但是,胡汉民看到/全国各地的党部确能竭尽职守的很不多见⁰,/省市以下的党部差不多都不见有何积极的效能,尤其是不能做到两句话:接近人民,领导人民⁰; /人民对党不但不欢迎,不感觉需要,反而嫌多⁰。^{1/2}1931年陈肇英在视察福建省党务时,发现地

¹ 胡汉民:《训政期间党部的责任如何》,1930年3月8日(上海)《民国日报》。

⁰ 胡汉民:《党的训练问题》,《中央党务月刊》第31期,1931年2月。

» 胡汉民:《训政期间党部的责任如何》,1930年3月8日(上海)《民国日报》。

^{1/4} 金铨:《厘定党政军官职俸等级表刍议》,《人事行政》1942年第1期。

^{1/2} 胡汉民:《训政期间党部的责任如何》,1930年3月8日(上海)《民国日报》。

方党部与民众格格不入,而外来教会组织却颇能赢得民众的信仰。陈认为其原因很简单,即教会为民众排忧解难,地方上某家某团体出了事,教会中人就会去排解,此外如修桥补路,举办各种慈善事业等,扮演了传统士绅所担当的角色,而地方党部和党员则不肯为。¹

国民党中央对基层党部和党员的期望本身就不切实际。以城市为中心,以知识分子和官僚为主体的国民党党员本已疏离于广大农村基层社会。国民党中央号召党员到民间去,而基层党员则将办党当做往上爬的阶梯。战前农村党员本来很少,而这些/少数在农村作事的党员,从他入党起,有许多人便是想把入党作成到城中来找差事的一个工具。因此,一个原来在乡村很纯良的知识分子,他不加入党,还能在乡村安心工作,一入党后便常常梦想到那高高在城市中的县党部、省党部,以及中央党部去工作,或者希望他的上级党部能因为同志的关系,而在城市的机关中介绍相当的位置。²这样/不惟很难形成党在农村中细胞的发展,并且增加城市知识分子过剩的严重性³。换言之,地方党部未能成为国家权力向下扩张渗透的触角,却为地方/精英⁴提供了一条向上爬升的管道。1930年,江苏省党部调查各县党部工作情形时发现:/各县同志在省会逗留者有五六十人。此五六十人之中,皆为各县负责党务工作之同志,今竟有随意离职,不守纪律,放弃责任之情形。⁵当时江苏共有60个县,几乎每个县党部均有人借故勾留省城,为个人仕途寻找晋升机会。”

¹ 陈肇英:5视察闽省党务及宣慰军队之经过6,5中央党务月刊6第38期,1931年9月。

² 何汉文:5如何树立党在农村中的基础6,5中央周刊6第1卷第30期,1939年3月2日。

³ 5苏省各县党务状况6,1930年8月20日(上海)5民国日报6。

随着党部机关的衙门化,党部委员的官僚化,普通党员的特殊化,在国民党内部逐渐滋生出一批被当时人们称作/党痞0、/党棍0和/党混子0的寄生群体。余英时曾在《中国知识分子边缘化》一文中指出:/国民党内最初也容纳了不少知识分子。但自北伐成功以后,国民党实行一党专政,它便越来越和知识分子疏离了。北伐以后,社会上有-党棍子.的新名词流行,这是很值得玩味的。这个名词在无意中说明了国民党的基层干部或是出身-光棍.或者已-光棍化.。¹余英时进一步将/光棍0解释为缺少知识的流氓地痞,并将1924年改组后的国民党称做/边缘人集团0。如果仅从教育程度而言,战前国民党并非流氓地痞集团。但是,随着知识分子城市化,即使是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国民党也不可避免地出现如余英时所指出的基层干部/光棍化0现象。其时,国民党的中央和省市级的干部职员,基本上由知识分子组成²,但在县党部以下,/光棍0的成分越来越大。一方面,城市党员不愿到县以下基层党部去工作,另一方面,国民党中央也不重视对基层党务人才的培养,加之基层党部权力小、待遇差,几乎成为被人才遗弃的角落。/党部不选用人才,什么人都可以办党,没有能力的党员都收容到党部里来了。³就教育程度而言,省党部委员的素质一般不如省政府委员高;县党部委员的学历往往低于县长。故当时社会上流传着/学

¹ 余英时:《中国知识分子边缘化》,(香港)《二十一世纪》总第6期,1991年8月。

² 余英时举上海市党部宣传部长陈德征为例,说该人中学未毕业,是一个典型的都市流氓,与事实不符。陈德征毕业于杭州之江大学,历任中学校长、大学教授、上海市教育局局长,(上海)《民国日报》总编辑等职。参见徐友春主编《民国人物大辞典》(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4页。

³ 胡梦华:《临全大会以来本党的建设》,《中央周刊》第1卷第24期,1939年1月15日。

而优则仕,学而不优则党0的说法。¹ 一些无才无德的土豪劣绅和地痞流氓趁机而入。一个开口/三民主义0,闭口/本党0的职业/党棍0群体由此而起。曾任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和组织部长的朱家骅曾为这一群体做过界定:第一,靠党过生活。第二,依党做护符。第三,藉党争权利。²

很显然,基层/党棍0群体的崛起,与国民党中央所期望于党员的民间精英角色,完全背道而驰。党部与党员不仅失去民众的信仰,甚至遭到地方政府人员的蔑视。曾养甫在考察湖南、湖北两省国民党党务时发现:/党员对党是消极,人民对党是失望,地方政府对党是责备。0”党不仅未能成为官民之间的桥梁和纽带,反而充当了一个与官争权,与民攘利的角色。

面对清党反共和执掌全国政权后所发生的严重腐化和蜕变,亦有少数国民党有识之士痛心疾首:/任凭党员腐化到了快要出虫,党员反动到了公然杀人打劫,党之名誉与党之威信被地方父老一般民众唾弃得不成样子, ,无怪现在一般青年同志,受此种严重之教训,莫不灰心短气,群趋于消极沉闷悲哀之一途, ,青年志气之颓废与堕落,亦殆未有甚于此时者,其有意志更横决,信仰不坚定者,则且相顾而之他。0有的更愤激地声称:/如果说如此便是革命,谁不愿反革命!如果说如此便是国民党,谁不愿退出国民党!0³

这些言论,多出自当时国民党喉舌5中央日报6的报道。这些报道清楚地反映出执政未久的国民党已蜕变腐化到了何等程度。

¹ 高廷梓:5过去党义教育的检讨与今后党德的实行6,5中央周刊6第1卷第21、22期合刊,1939年1月1日。

² 胡汉民:5训政期间党部的责任如何6,1930年3月8日(上海)5民国日报6。

³ 陈兴唐主编:5中国国民党大事典6,中国华侨出版社1993年版,第297页。

⁴ 5在下层工作同志的伤心惨绝的呼声6,1928年4月10日5中央日报6。

当时民众毫不隐讳地表示对国民党的极端厌恶。在当时老百姓眼中，‘有党就有事，没党就没事’¹。‘党’成了争权夺利和惹事生非的代名词，也成了丛集人们厌恶、痛恨、谴责和嬉笑怒骂的众矢之的。

但是这个弊病深重的政权并未在战前即土崩瓦解，而仍苟延残喘相当时日。也许，从失民心到失天下，亦有一个需要若干时日的过程。战前舆论对国民党的观感，有助于我们修正这样一种观念，即认为国民党的腐败无能和失民心主要是在抗战后期和抗战胜利以后才充分显露的。

1作者王奇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1000062

—责任编辑：谢维—

¹ 5浙省指委会对戊辰社专电及省府秘书处宣传室新闻稿的驳正6, 1928年8月25日5中央日报6。

Modern Chinese History Studies

No. 5, 2003

The Hong Kong and Macao Main Bureau of the Royalist Society and the Movement to Rescue the Emperor 救皇帝運動，Sang Bing (1)

During the movement to rescue the Emperor in 1900, the Royalist Society established its main bureau in Hong Kong and Macao. With the substantive support of He Dong, He Tingguang and other prominent people in Hong Kong and Macao, the bureau took advantage of this favorable location to pursue such projects as raising money, gathering its members together, and buying and transporting weapons. The bureau also tried every means possible to coordinate and manage its internal relations and its relations with other reformist elements, with revolutionaries, and with the British authorities in Hong Kong. In order to carry out these important tasks, the Society concentrated many of its key members in the Hong Kong and Macao main bureau to work together in a coordinated fashion, and continually strengthened their forces. Unfortunately, Kang Youwei's students were not able men, and their relations were very complicated and ridden with conflicts. The various directors of the bureau were not up to their responsibilities, and as a result the members of the Royalist Society could not communicate well or cooperate with each other. Incompetent management and ineffectual leadership not only made them miss the opportunity to successfully pursue the movement to rescue the Emperor, but also sowed the seeds for the incessant inner conflicts of the Royalist Society's later years.

The Guomindang's Organizational Degeneration after the 1927 Purge 1927年清黨後國民黨的組織退化，Wang Qisheng (38)

In the historiography of the 1927 purge, the Guomindang praises it as a movement to safeguard the Party and save the nation⁰, while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denounces it as a counterrevolutionary coup d'etat.⁰ Both parties focus on the heavy blow this movement dealt the CCP, and ignore its direct impact upon the Guomindang itself. For the Guomindang, the purge was an elimination of able men in the Party. The injury to the Guomindang over the course of the purge was no less than the loss to the CCP. After the purge, there was no one to whom local party power could be entrusted, and local tyrants, evil gentry, opportunists and corrupt elements were allowed to encroach upon the local power base, and use the Party to oppress local society. On the eve of World War II, the Guomindang's rank and file still had not recovered its pre-purge membership. Th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party members did not match the Party's regional political power bases. The state of Party affairs and organization has been aptly

described as/ the Party is in the upper classes, but not in the lower classes; the Party is in the cities, but not in the countryside; the Party is on the coast, but not in the interior.⁰ Before the War, the majority of the Guomindang's party members were from the middle or upper classes. The Guomindang did not educate its party members to be a model for all society, but recruited people who already were or had potential to be in power. A study of prewar public opinion's view of the Guomindang can help us revise the idea that the Guomindang's loss of support among the people only became clear during the late war years and postwar period.

Reasons for the Failure of the Fifth Ant-Encirclement Campaign: An Investigation not Focusing o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Military Strategy , , , , , , Huang Daoxuan(80)

The Guomindang and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fifth/ Encirclement⁰ and / Ant-encirclement⁰ campaigns from 1933 to 1934 constituted a total war between two political powers with independent territories, governments and social organizations. The war ended in failure for the CCP. Aside from the widely known problem of unwise military strategy, the failure of the CCP was related to changes in the Guomindang's strategies and tactics. Not only that, quite apart from / leaning⁰ subjective factors, the mistakes in the CCP's military strategy were themselves also closely related to pressure from the Guomindang. As a protracted war of attrition waged by the Guomindang and met by the CCP, the campaign found the Soviet Area hard put to provide the personnel, material and other war resources needed for a protracted campaign of attrition. The erosion of the CCP's political resources under the / leftist⁰ leadership further prevented the CCP from making full use of its fighting abilities. All of these factors affected the ultimate outcome of the war to some extent.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and the Ant- Christian Movement in China , , , , , , Tao Feiya(114)

The Ant-Christian Movement in China in the 1920s was a political struggle directed by the Russian Communist Party (Bolshevik) and the Far Eastern Bureau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sponsored and led by the CCP and joined by members of the Guomindang and other organizations. The Russian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regarded the steady development of Christianity and growing pro-American feeling among Chinese youths as obstacles to getting the Chinese people to follow the Russian road of revolution. Therefore, the aim of the Ant-Christian Movement was to combat Western religious forces in China, weaken the West's influence, arouse nationalist feelings in young Chinese, and extend the influenc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among Chinese youths. The movement's policy was to use the fight against Christianity to achieve its